

毛泽东铁面无私打掉七只“大老虎”

“打老虎”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腐败蜕化的现象。毛泽东曾铁面无私地处死谢步升、黄克功、唐达仁、左祥云、肖玉璧、刘青山、张子善等七个“大老虎”。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从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这次反腐运动中，决谢步升就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枪。

苏维埃裁判部根据朱秀秀提供的线索，暗地里对谢步升进行了调查。仅仅两天，裁判部就基本掌握了谢步升违纪违法事实。调查人员将有关情况向时为第一任临时最高法院主审的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面对调查材料，非常感慨：谢步升出身贫苦，很有魄力和干劲，原本是棵好苗子，没料到竟然在背后欺男霸女、谋财害命。由于涉案者身份特殊，且人命关天，案情重大，何叔衡向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邓小平了解到案情后，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按照何叔衡的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又向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后，马上表示：“谢步升案我听说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消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革命将领黄克功逼婚不成举枪杀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正当八路军夺取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平型关大捷，所属各部队正准备迅速向敌后进发，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高潮之际，在延安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案件——八路军将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黄克功逼婚杀人事件，一时间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共产党的“桃色案件”，抢先发表，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

黄克功本人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外，请求法院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报告时，毛泽东很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对于黄克功犯下的罪行，中央领导的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黄克功毕竟是毛泽东的同乡，一个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长征时任警卫团团长，担负着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在战斗中身上曾留下了多处伤疤。在陕北简陋的窑洞里，当收到爱将黄克功的信时，毛泽东流泪了。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尊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在情与法之间，在感情与大义面前，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并请雷经天在公审会上宣读了给他的信。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部长何叔衡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何叔衡认为：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方便调查核实，不能因此随便轻易处理群众来信。他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察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第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达仁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左祥云贪污246元7角被处决，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

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路厅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

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抓获后，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遗。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从红军英雄蜕变为腐败分子的肖玉璧，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审讯肖玉璧，肖玉璧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高等法院检察署经审查终结，认为肖玉璧贪污案证据确凿，遂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判决理由：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利用职务进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革命。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极大。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后，肖玉璧不服，并与执法人员吵闹要求面见林伯渠，林伯渠念及肖玉璧是老红军英雄，便答应见他。肖玉璧见到林伯渠后就说被判处死刑太重了，要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林伯渠最后答应了肖玉璧的请求。

最后，毛泽东对林伯渠说这次处罚肖玉

璧与黄克功案一样，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由红军英雄堕落成贪污犯的肖玉璧被惩处后，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1942年1月5日，边区《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评论指出：“肖玉璧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据说，边区近两年来，贪污案件占总案件百分之五还强，反贪污的斗争是非常要紧的！”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震动全国、教育全党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并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副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据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时尚迷或许不会想到，自己衣橱里那些剪裁各异的女裤，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赐。

1914年8月，随着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序幕。100年后的今天，有关“一战”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就连向来不问政治的时尚产业，也投入到缅怀“一战”的行列中。人们在对抗战争受害者悼念之余，也在反思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为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

对时尚人来说，“一战”是个不能忽略的名字。它终结了女性的“束身衣时代”，为时尚界引入“男装女穿”的新风潮。也许正因如此，才会有众多时尚展览把目光投射在“战争是如何影响女性服装”这一主题上。

在英国历史名城巴斯的时尚博物馆中，8月31日结束的展览《战争中的服装：战争后方的家庭与时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本次展出的20多件服装大多是有着修道院风格的“一战”女装。这些老物件向人们展示出当时最热的女装潮流——当战争打响，女人开始穿得像个男人。

“‘一战’改变了女性的生活，也改变了她们的着装方式——几乎所有的健康男性都被征召入伍了，女人不得不接过原本在男人肩上的担子，扛起生活的重任。许多女性第一次穿上了长裤，束身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该展览组织者伊冯娜·海林·霍布斯告诉英国“每日野兽”网站记者。

英国作家凯特·阿迪在其著作《战争后方的战斗：“一战”中女性所带来的馈赠与灵感》中，详细描述了战争的阴霾是如何让女性改变自己的角色的——“她们把丈夫的衣柜搜刮一番，将其中一些衣物再次剪裁，使其更加合身。女人们穿着这些改良后的男装参加工作，以保证战争的‘后方’。人们起先对这种标新立异的着装方式白眼相向，但它日渐得到认同。”



如今的女装并不拘泥于妩媚、甜美的风格，简约、实用正成为现代女装的主流。（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时逢“一战”百年纪念热潮，不少设计师趁势推出了军装风作品，表达对战争的反思。

感》中，详细描述了战争的阴霾是如何让女性改变自己的角色的——“她们把丈夫的衣柜搜刮一番，将其中一些衣物再次剪裁，使其更加合身。女人们穿着这些改良后的男装参加工作，以保证战争的‘后方’。人们起先对这种标新立异的着装方式白眼相向，但它日渐得到认同。”

这种趋势并非英国独有，许多国家都有相似的状况。新西兰时尚博物馆正在进行的“我们着装的方式”展览，就是这股风潮的最佳佐证。该展览展出了大约60张“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市民生活照，真实反映了战争年代当地女性的生活状态，以及战争对女装风格的影响。

“当男人们不在家的时候，女性就开始参与那些曾经只有男性参与的工作，比如在农场和工厂干活。”“我们着装

的方式”策展人多丽丝·德彭说，“在这种情况下，过于浮夸的服装显然不合时宜。女性把装饰华丽的珠宝盒扔在一旁，转而穿上那些色彩柔和和平实的服装，或是那些被称为‘战舰’的简单灰色衣裤。”

战争让女性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以至于战后她们也不愿再回到以前的性别定义中去。许多女性在战争中走出家庭，投身商界、体育界、娱乐圈乃至政界，她们为自己争取权利，也因此成为真正的公民。女性对穿着丝绸长袍闲坐在家感到厌倦，套上简单的工衣裤出门工作成了新的潮流。

女装的定义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度象征着“恬静的家庭生活束身衣”不再是女性的首选，融合男装设计元素的服装越来越受欢迎，行动自由方便成为这类服装的最大卖点。

“毫无疑问，时尚在战争年代发展有所迟缓，但它并没有完全停下脚步，事实上它仍存在‘后方’。人们正用有限材料证明自己的创造性和奇思妙想。”德彭说。

“一战”促进了实主义服装的形成，同时也刺激了设计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进行设计。巴黎从此不再是唯一的时尚风向标。由于战时物资匮乏，纽约靠“兼顾女性气息与实用性的设计”爬上时尚舞台，这种风潮甚至延续至今。

或许是为缅怀这段历史，在今年的各大时装周中，不少设计师推出了具有战时风格的作品，多数反响热烈。在这些作品中，最受注



如今，凸显女性柔媚特质的服装已不再是女性的第一选择。

目的或许是设计师汤姆·布朗在巴黎时装周上的新作。秀场上，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模特身上那些酷似军装的华服，仿佛置身于“一战”时期那些令人窒息的阅兵式中。这一刻，人们似乎从这些复古的衣装中，找到了自己与那场百年前的战争间的微妙联系。

（据人民网）

唐朝诗人的“博客”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诗人们写完了诗，在什么地方发表呢？其实，唐朝诗人也有自己的“博客”，就是“诗墙”“诗板”“诗瓢”及“诗屏”。

当今社会，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写完了文章，都可以自由地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供人欣赏，那么，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诗人们写完了诗，在什么地方发表呢？其实，唐朝诗人也有自己的“博客”，就是“诗墙”“诗板”“诗瓢”及“诗屏”。

所谓“诗墙”，就是把自己的诗作写到墙壁上供人们观看，当然，墙壁是有选择的，要选择人流量大的闹市街铺、风景名胜、交通驿站等地的墙，这样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但墙壁毕竟有限，很快就都写满了，而且过一段时间，如果想更换内容的话，还得重新粉刷一遍，再把新诗写到上面，有点麻烦。于是，有的诗人便想出了新的办法，就是把诗写到一块木板上，再把木板悬挂在闹市的墙壁等处，既扩大了墙壁的容量，又易于更新，这就是唐朝诗人的第二种“博客”——“诗板”。

古代有一部分诗文的内容就是记载“诗板”的，如唐张祜的《题灵彻上人旧房》诗“寂寞空门支道林，满堂诗板旧知音”；如郑谷《送进士吴延保及第后南游》诗“胜地昔年诗板在，清歌几处郡筵开”。后世的文人，也在诗文中记载了唐朝的“诗板”，如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章八元》：“长安安慈恩寺浮图，前后名流诗板甚多，八元亦题，有云：‘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如清马曰璐《哭泮江太史》诗“忍看闲房诗板在，暮帆驰影落平田”，都反映了唐朝时“诗板”的盛况。

唐朝诗人的“博客”，除了“诗墙”和“诗板”之外，还有第三种——“诗瓢”。所谓“诗瓢”，是一些居于深山古寺的人所常用的发表诗歌的方式。这些人与人接触极少，诗写好了之后，没有人赏读，怎么办呢？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写好的诗装在葫芦里，再将葫芦投到小溪、河流中，葫芦随水漂流，如果有人看到、捞起、打开，这些诗就有读者了，唐代僧人唐球就曾用此种方法传播自己的诗作，在一次投放葫芦后，他感慨地写道：“斯文不沉没，方知吾苦心！”

唐朝诗人的第四种“博客”，是“诗屏”，就是写好了诗以后，把它们写在家中的屏风中，这样客人来时，就能读到了。需要指出的是，唐朝诗人在屏风上所写的诗，不一定只是自己的，有时也会把朋友或偶像的诗写到上面，比如，白居易就曾经把元稹的一百首绝句写在了自家的屏风上。作为报客，元稹便在一堵寺庙的墙上写满了白居易的诗，白居易由此感叹道：“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

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唐朝诗人为了推广自己的作品，竟也想出了这样多的招数，今天想来，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今人还是古人，都有强烈的表达意愿，都渴望着能得到别人的欣赏，因此才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博客”来。

（据《羊城晚报》）

户籍演变史：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

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了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至，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

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敦煌地区的计账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这种户籍格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民国时期先后出台了《户籍法》（1931年）和《户口普查法》（1947年），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1946年），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据《法制日报》）

“巾帼”原是古时的一种配饰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

巾帽原是古时的一种配饰，宽大似冠，内衬金属丝套或用削薄的竹木片扎成各种新颖式样，外裱黑色缁帛或彩色长巾，使用时直接戴在头顶，再绾以簪钗。这种头巾式的头饰叫巾帽。巾帽的种类及颜色有多种，如用细长的马尾制作的叫“剪毫帼”；用黑中透红颜色制作的叫“绀缁帼”。先秦时期，男女都能戴帼，用作首饰。到了汉代，才成为妇女专用。《三国志·魏志》中有著名的一出戏：诸葛亮出斜谷向司马懿挑战，但后者避而不出，诸葛亮便用激将法，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巾帼妇女之饰”，以示羞辱。巾帽后来引申为女子的代称，如今已是对妇女的一种尊称。（据人民网）